
溯江探源,再度入川断想

章人英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能光靠熟读几本经典著作,不能脱离传统文化所依存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生活中的时代背景向壁虚构。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比较分析,用当前的话说,就是要运用科学发展观,做一次全面的、有系统性的探讨,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这次我的古文化之旅,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做的一次新的尝试。

我初步的设想,是采用文化区位研究法中的比较研究法,选择两个不同特质的区位,从纵横两方面做一次综合的考察。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大陆地区有着一定的区别,由来已久。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间,这种差异更明显地凸现出来。我选择上海和成都两个社区做典型调查,相互对比。前者重点放在创建现代文明的研究,后者重点放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研究,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多种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方法,从人文历史背景、自然地理环境、文化精神面貌及社会生活现象这四个方,梳理出这两个社区的文化结构所不同的主要因素,为我们今后学习国学、倡导国学,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由于时间短暂,且精力所限,最后决定把课题内容约缩,仅对转型中的成都市社区文化的今昔异同,做一个纵向对比。原有计划只有留待他日再议了。

一、连接东西方古文明的一条神秘之路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指学问之道,不能单凭书面上的认识,必须重在实际行动——实地考察。我已九六耄耋高龄,无复豪游壮行的雄心壮志,因此把这次的旅程,局限于从上海到成都。上海处于东海之滨,地理上约位于东经120度左右,与成都相距约2000公里,同处于北纬32度左右。北纬30度横贯亚、非、拉美三洲,人们称之为一条神秘的地带。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五大宗教发祥地及一系列的世界奇观,都分布在这一地带的两侧。单从长江流域的文化而言,吴越地区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江汉地区的荆楚文化和巴蜀地区最新发现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村文化等,如同星罗棋布一般,都散布在这条神秘之路上。它们形成的年代都在公元前2000年到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从而说明一个文化的形成,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水、气候、地势等)、历史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力、人口流动、社会组织……)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对古文化的研究,也应运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方法,做综合的考察,把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中存在的密码——破解出来,吸其精华,古为今用,让它在现代化建设中焕发新的生命活力。

二、成都: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直观教育基地

倡导国学,首要是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这里有几点疑问: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的表

现形式是怎样的？第二，这种形式在今天日常生活中是否还存在？第三，对于传统文化，常言要做到去芜存菁、推陈出新，这种取舍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第四，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社会中，还能起到多大作用？在这几年学习国学的过程中，上述疑问经常盘旋在我的脑海深处。经过两个月来的访问调查，我惊奇地发现成都是一座走出经典书院、对外敞开、无师自通的大课堂，是一所倡导国学的社会大学，是一个传统文化的直观教育基地。

成都地区的古代居民大都来自西方高原氏族和羌族，他们创造了代表巴蜀地方特色的巢民文化和青铜文化。据说有巢氏就是他们的祖先。今年在成都市区还发掘出木结构干栏式的巢居建筑遗址，它的年代相当于殷周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三星堆文化、金沙村文化的发现，将巴蜀文化提前了二千多年。我们常称中华民族有五千余年的光荣历史，过去主要指的是黄河流域的文化，这种一元论的观点已被近人所否定，现在又从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中得到了重要的依据。

三星堆文物和金沙村文物的出土，使我们不但对巴蜀文化、甚至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为我们倡导国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有人把这一发现描述为“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神妙的心灵世界。它是巴蜀文化两千年积累、变异和发展留下来的历史传统和宝贵遗产，构成了巴蜀文化的特性”。这一文化特性，经过五千多年保留下来的历史积淀，千百万次的潮起潮落，它的潜在功能，今天还在影响成都文化的成长发展。具体体现在他们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观，对个人的清静无为、飘逸潇洒人生观方面，把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主要元素的道家的守静致虚、道法自然；儒家的仁民爱物、推己及人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面貌，在今天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到处可以看到。总之，我对成都的感悟，仿佛在金沙遗址上看到一幅人工塑造的古“金沙世界”美丽的家园的立体画图，只是它已披上了21世纪的现代化的外装罢了。

三、一幅理想的现代化城市的画卷

成都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成都并没有沉睡着，她也是在与时俱进、日新月异。尤其在党中央发出开发大西部的号令下，由于成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而重要的战略据点，这种现代化转变的进程，以独树一帜的面貌在广漠的大西北平原上呈现出来。具体情况，从成都最近大力提倡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这一宏伟计划中可以看出。

回忆上次来到成都，当时正提出“城乡一体化”的设想，我觉得这种想法很新颖，对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城市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火车头。但由于近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畸形的发展，土地资源、能源资源、供水资源等过度地透支，导致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沿海与内陆的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与失衡，带来能源短缺、生态失调的危机，如果城乡一体化倾向于乡村城市化发展，其后果是值得考虑的。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在城乡一体化实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和深化，它较之城乡一体化的旗帜更为鲜明，从它所构思的核心思想、目标定位、具体特征等一套规划蓝图来看，确是令人感到“特色鲜明，独具魅力”。但所提出的“世界级、现代化、超大型和田园城市”的四个基本要素，是否口气太大，理想太高，这还要留待时间的考验。就我们站在倡导国学、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创建现代文明这一立场来说，成都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国内各大城市中是鲜与伦比的，如能加以正视，把前人留下来的朴质求实的精神发扬光大，做到古为今用，那么对“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规划的实施，文化软实力一定能发挥更重要的潜在功能。

四、从中华文明看人类文化的趋同

这次我的古文化之旅,由于行程匆促,考察还不够周详,但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一次直观教育,在感性上增加了一定的认识,对怎样创建现代先进文明和今后人类文化趋同的走向问题,得到了新的启迪。现提出了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为什么我们称“中华文明”,又说“人类文化”?这里首先要厘清“文明”与“文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赖以生活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总和;而文明是一个民族社会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的标识。文化的发展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发展的结果,文化的含义较广,和文明又可用作同义词。通俗地讲,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共同财产,文明是一个社会的私有财产;文化是多元的,是可以共享的,可以趋同的,而文明是有一定价值观念,不能强求一致的。“良渚文化”和“巴蜀文化”都属于长江流域的文化;长江流域的文化和黄河流域的文化都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彼此一脉同源;而代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华夏民族文明,就不能等同于代表基督教、犹太教教义的西方民族社会的文明,这是由于价值观念不同的关系。文明的差异,应相互尊重,相互借鉴,允许同时存在,毋需厚此薄彼,即使全世界人民都进入地球村时,这一区别也不会完全消失。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是值得引起世人思考的。

其次,如上所述,既然代表每个民族(社会)的文明各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那么我们传统的中华民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

这次在成都看到的从三星堆和金沙村出土的文物遗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太阳神鸟”、“十节玉琮”、“青铜神树”和各种不同青铜造型的“人身鸟足像”、“鸟身人面像”等,有人称之为“从实物中体现了古蜀人以太阳神鸟崇拜为中心的天地太极、阴阳相生相化的观念以及追求光明、和谐与智慧的精神”。这一发现,也使我们真正探索到了中华和谐文明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它也是构成道家的清虚无为、道法自然的思想,与儒家的仁民爱物、推己及人的思想的历史依据。同时也充分地证实了今天成都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贴近自然,犹如行云流水的、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是得益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最佳的体现。

最后,“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指导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进程,为什么近百余年来,自西学东渐,国人对它的价值观念产生了一个裂变?是否我们中华文明本身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值得人们引发一番虚心的反思!

“天人合一”的总纲领,是构建和谐社会,提倡民本思想。这一观点,古代的经典著作中都有充分的阐述。如道家的“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但这一崇高精神,为历代封建专制王朝所歪曲误导,用作巩固封建统治、压迫人民的理论依据。这一奴役人民思想的流毒所至,使尊重自然法则成为听天由命,维护人民安定成为安分守己的戒律,人民还有什么个人自由和权利可言。近年来党中央领导一再发表构建和谐社会、提倡以人为本的重要讲话,这不仅是反映了执政当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省悟到这一“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在国内经济繁荣发展、国际信息频繁互通的影响下,对文化这一潜在功能做了一次新的诠释。